

# 从生产到日常生活： 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与范式转换

## ——以新城市学派为例

尹才祥，闫铭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摘要]** 新城市学派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城市批判相结合的研究，并致力于实现马克思城市解放这一中心议题。随着资本主义城市功能和主题转换，新城市学派批判范式开始由生产到日常生活的转变。其中，列菲伏尔由原来宏观上立足于经济基础、生产方式交互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运作机制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叙事批判，转向微观生活领域的日常生活批判；卡斯特从资本和阶级批判转向集体消费和网络社会批判；哈维从以资本积累为理论中轴的生产方式批判转向社区和城市权利批判。总体上，新城市学派城市批判呈现两大特点：一是理论远离宏大叙事，走向微观生活领域；二是远离马克思主义中心议题，但解放议程的价值目标不变。

**[关键词]** 新城市学派；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日常生活；城市批判

**[中图分类号]** B5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1)01-0054-07

新城市学派理论是上世纪中后期被公认的当代最有影响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之一。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和曼纽尔·卡斯特堪称其卓越代表。他们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改造，试图解构和重构刻板的城市历史叙事，其终极目标是要实现马克思的城市解放议程。随着资本主义城市功能和主题转换，新城市学派理论研究的视域和姿态出现转变，开始从生产方式分析转向微观消费生活领域，重新阐释马克思关于生产和劳动的异化本质，使资本主义社会再结构化。这一城市批判路径的转变被西方诸多学者解读为是对马克思城市中心议题的偏离甚至是背离。本文通过揭示新城市学派理论的发展脉略、逻辑演进、理论分歧的内在根由及其理论走向，探讨一种面向未来的、开放的而不是现成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体系。

### 一、生产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改造

对现代城市社会重大现实的观照是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基本出发点。随着工业化的全球扩展，城市化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如同塞西尔·罗兹所指出的“扩张是一切”<sup>[1]</sup>。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现实出发，批判吸收资产阶级学者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城市思想，逐步

**[收稿日期]** 2020-11-07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空间正义视域下我国当代城市治理研究”(17BKS036)；省社科基金项目“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及实践创新研究”的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尹才祥(1977—)，男，江苏徐州人，哲学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哲学。

形成了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城市发展规律及其本质的城市思想,散见于19世纪中后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等著作中。其间,马恩的理论焦点集中在城乡对立及城市阶级斗争上。在马恩看来,城市的发展有其“自然性”和“阶段性”,如同发轫之初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城市只扮演三种功能一样:“构建神圣的空间、提供安全的基本保障、拥有一个商业市场”<sup>[2]</sup>,彼时的城市只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条件而不是动因出现。“除了恩格斯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外,马克思主义没有追求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空间、劳动阶级的形成结合到一起的议程”<sup>[3]137</sup>。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独创性思想在于生产方式的分析,主旨在历史科学,城市与空间并非他们关注的焦点。因此,城市问题研究并不占据中心位置。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没有把城市和资本主义批判以及解放议程联系起来,原因就在于他们将城市工人阶级当作了社会转型希望的中心。正如桑德斯认为的那样,“一旦资本主义建立起来,城市问题就不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关注点,因为生产渗透到了社会,其关系无关乎城市和乡村的边界。”<sup>[3]34</sup>二战以后,城市重建、改造和发展的世界性浪潮要求从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联系中寻求对城市冲突和矛盾的解答。

城市主题和功能的转换迫切要求城市研究范式的更新,以此回应“福特制”的天然“短板”所造成的“地理政治危机”,这也是城市地理学家哈维等致力于把历史唯物主义提升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内在根由。新城市学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角进行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批判,该学派初创性主张源自法国空想马克思主义传统,肇始于列斐伏尔、卡斯特为奠基,后为哈维进一步发展,注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框架内考察城市问题。列斐伏尔第一次打破了马克思主义在城市方面的沉默,向马克思主义显示了回到城市之路。但新城市学派没有继续探索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城市问题,如城乡差别、城乡对立、城市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等,而是以城市空间结构、空间生产、资本空间积累、城市消费、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城市权利等为主题,尝试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并不受到重视的“空间批判视角”对现代城市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城市空间发展之间的关系等进行研究,并以这种方式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分析工程:对划时代的思考,对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积累过程的分析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复杂性社会理论的发展。

在列斐伏尔经典之作《空间的生产》之前,还没有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空间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及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给予足够的理论和政治重视。他在《资本论》中寻找到灵感,视空间、劳动及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具有本体论地位,资本主义是其空间生产理论的中心议题,对空间的探讨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论体系。最显其洞见的观点是:20世纪的资本主义之所以残存并得以继续发展得益于空间本身的直接生产。他坚持认为,对资本主义的审视必须与资本主义全球空间生产的现实语境结合起来,其中,城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重要维度,而且是以资本的逻辑在进行。甚至认为,如果不能通过城市空间生产推动人类文明进步,马克思主义也将无法完成其解放议程。而马克思似乎对空间的这一独特作用“不屑一顾”。所以,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把“空间”尤其是“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视作资本主义得以“苟延残喘”的内在根由,并置于资本主义运作机制和运作体系的中心地位。在《城市权利》中,他视城市为自由和解放的重要载体,视城市权利运动和城市革命为重要手段和途径。“差异空间”是列斐伏尔进行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批判的理论归宿,面对同质化空间的窘境,他试图通过“差异空间”的探讨寻找新的空间生产和政治秩序的可能性。哈维一直坚称自己是“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汲取《资本论》的生产理论,将城市空间视为过剩资本和剩余劳动最有力的吸纳方式,在他看来,城市发展史就是城市空间生产批判史。

可以说,新城市学派将城市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结盟并使其空间化正是基于以下两点:一是主观上借鉴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研究方法;二是客观上因为“空间作为劳动的客观条件”进入生产领

域这一历史条件。在此双重作用下,才把城市空间问题作为重大论题提出并在城市研究中发扬光大。新城市学派在“重新发现”和“重新设计”基础之上“回到马克思”,开启并实现了城市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空间化改造,用实证主义方法突出强调了在城市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资本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延续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将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作为中心议题的研究方法,重新焕发了马克思主义内部有关城市对话的活力。总之,新城市学派将城市历史叙事空间化,赋予持续的时间以一种经久不衰的批判地理学视野,试图解构和重构刻板的城市历史叙事,在无限开放的城市空间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议程。

## 二、日常生活批判:城市批判范式的转向

新城市学派形成之初,其代表人物在总体上都坚持了从生产方式入手分析资本主义城市问题,只是各自切入城市论域的视角和路径不同。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的完成,城市空间生产作为解决资本、劳动力过剩的场所和功能逐渐消失,城市批判的焦点是否还集中在生产领域?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否还适应城市问题分析?列斐伏尔、卡斯特、哈维等人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批判路径和视角开始转换。

其一,从宏观生产领域转向日常微观生活领域。应该说,列斐伏尔以马克思主义进入城市,的确为城市研究打开了一扇窗口。爱德华·索亚这样评价列斐伏尔,“即便在今天,他依然是富有原创性和最杰出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者”。<sup>[4]</sup>但“遗憾的是,列斐伏尔并没有理解经济基础与生产方式在马克思那里是同一系列的范畴,它们的内涵是一致的,差别仅仅在于静态与动态两种不同的视角。”<sup>[5]</sup>他把生产关系等同于经济基础,而把生产方式理解为特定的社会,割裂了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的内在统一。尽管他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城市的先河,却没能将这一“城市革命”进行到底,导致他在资本主义城市批判视角和立场上逐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最为关键的是,列斐伏尔自己认为,他并无打算运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城市议题,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可以将我们带上都市时刻,但不能将我们带进都市时刻。”<sup>[3]98</sup>或许列斐伏尔认为在马克思宏大历史叙事中看不到实现城市解放议程的曙光,他才把日常生活提升到与经济、政治同等重要的地位,从微观化的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多重异化。

纵观列氏著作,批判路径有三个:全球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批判、资本主义城市化批判和日常生活批判。他的后期研究重点放在“日常生活批判”上。当然,列斐伏尔不是“日常生活批判”的始作俑者。此前,卢卡奇从异化的角度肯定了“日常生活”的革命力量和批判功能;海德格尔开创了“日常生活”的现象学研究;不同的是,列斐伏尔将“日常生活批判”转向一种空间的政治学,他视异化的日常生活世界包含着被压迫的因素和解放因素;同时,日常生活是社会活动和社会制度结构的深层连接处和总体性革命的策源地。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乃是我们辩证地批判进入到最深刻的最直接的外部世界与社会世界的汇聚地,并由以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社会实践的枢纽和要津。不仅如此,列斐伏尔和法兰克福学派一样,认为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的统治不仅表现在物质生产与消费领域,还有对人精神文化心理无孔不入的控制。显然,列斐伏尔并没有失去实现解放议程的价值目标,由原来宏观上立足于经济基础、生产方式交互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运作机制基础之上的空间批判,转向微观生活领域的日常生活批判;其真实目的是,由实现资本主义替代这种“大我”的解放,转向通过资本主义控制之下个体“小我”的解放来实现“大我”解放的突围。

其二,从资本、阶级批判到集体消费和网络社会批判。卡斯特认为城市矛盾集中于消费领域,城市问题本质在于集体消费的国家控制与人民的反控制过程;他将阿兰·杜兰的社会运动理论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综合到自己的理论中,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中起了推动作用。他在《城市

问题》中批判地吸收了列斐伏尔关于空间和城市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中心性洞见,首先将城市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城市,主要轮廓是由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构成。但在理论上,反对列斐伏尔将自己研究基础放在从早期马克思那里拿来的异化主题之上。他认为城市斗争无需直接或必然地与劳动阶级工会和政党联系起来,因为以集体消费为基础的社会分工越来越摆脱传统社会的结构,消费成了资本主义的支点和城市中心问题,“消费被赋予了和生产同等的价值”<sup>[3]110</sup>,“城市不只是消费活动得以发生的场所,而且直接成为消费对象,一个激发消费者欲望、让其产生消费愉悦的纯粹表象”。<sup>[6]</sup>在整个研究中,卡斯特以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解城市空间并把城市消费作为理解城市问题的支点,视集体消费为导致城市政治后果的唯一因素。他还甚至以一种形式主义者和还原论者的方式处理资本主义积累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他在《城市与民众》一书中注重将人的精神因素或行动作社会冲突的动力,明确否定将马克思主义继续作为理论基础。在他看来,城市问题的核心越来越不是资本逻辑直接强加的问题,而是有计划的国家干预和权力运作的产物。

在《城市与草根》中,卡斯特将他的注意力中心转向了城市社会运动的历史和斗争中的人的能动性,重点在认同、语境、偶然性、文化、可变性和社会意义上,认为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冲突和社会变化的唯一轴心,至此,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再占据理论的特权地位。但在《城市问题》中,当结构主义与实证主义发生难以调和的矛盾时,他选择了后者。“当他所期望的革命运动延宕无期之时,他连马克思主义也一并加以放逐,最终皈依了他所激烈反对的主流社会学理论,转而开始探讨技术社会学,并致力于建构网络社会理论。原先激进的革命斗士似乎已被主流政治收编。”在《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三部曲中(《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的终结》),卡斯特开始关注技术学意义上的网络社会,致力于以知识为基础的生产力的解放探讨。他认为技术与网络使资本主义社会再结构化,必将形成新的信息资本主义。在谈到曾经以马克思主义理解城市问题时,他认为彼时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因为“恰逢其时”,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与日俱增的城市矛盾和冲突要求刷新城市理论,但他同时也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并不能完全应付这种挑战。他在更近的写作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轨迹中与群体认同、意义和集体行动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这也再次表明,卡斯特认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中看不到希望,他决心开辟有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路径,与列斐弗尔相比,他又似乎向前迈进了一步而且更加激进。

其三,从资本批判到城市权利批判。哈维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坚持马克思关于基本矛盾的分析方法,认为城市问题的本质依然是资本积累的矛盾。在其《社会主义的构想》一书中将城市空间整合到资本主义积累模式的分析之中,并且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的关系置于其关注的中心位置。在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著作《社会正义与城市》中,哈维扩大和扩展马克思主义论资本主义积累的著作,赋予它一个明确的空间维度。他在《资本的限制》中做得最为彻底,主要目的是重构马克思,并将空间内置其中,劳动、资本和货币穿行其中,从而使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分析更加强而有力。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享有特权的阐释者,这一立场似乎从未动摇过。他说:“假如资本主义继续作为主流的生产方式而存在,那么,我们必须从对这种生产方式的分析入手。”<sup>[3]103</sup>他一直肯定马克思主义在城市研究中的中心性地位,“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是唯一一种适合积极地建构对像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进程的历史格局一样复杂丰富事物的严密、全面、科学的理解范畴”。<sup>[8]</sup>在反思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的分裂和分歧时追问道:“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为了某些观点的折中而抛弃马克思吗?”<sup>[9]</sup>他新近的著作仍致力于“将空间的生产和空间的塑形整合为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化过程的核心之中的积极因素”<sup>[3]108</sup>。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依然处于其著作的最中心,至少,哈维是这样认为的。但在其新近研究中,哈维开始关注城市权利、网络社会和以社区为基础的争取城市权的斗争,这也被学界解读为哈维城市批判路径的转移,即以资本积累为理论中轴的城市批判开始转向微观生活。

### 三、理论思考:理论局限及未来走向

新城市学派在城市空间的社会建构问题上的解读有其独到和深刻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他们把对空间因素的强调融进了对社会过程一般理论的建构之中。不只是把空间的社会建构理解成一种政治权力的再生产,而且还把它理解成一种独特的历史地理景观,并且这种景观还是冲突性的。在一定意义上,新城市学派城市批判范式的转换,这些结合城市问题和时代发展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作了补充、深化和具体化,改变了传统城市科学自身的封闭性和局限性,同时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但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上述这些优点恰恰也暴露出了在解读方法论上的诸多局限性。对此,我们以卡斯特和哈维为例,从分析工具和方法论角度作重点分析。

首先,列斐伏尔最早从宏大经济政治叙事的批判构式转向日常生活批判,与德波等从日常生活习惯和不起眼的小事入手不同,列斐伏尔更擅长于形而上的哲学玄思,批判略显不够脚踏实地。晚期资本主义碎片化的生活方式,让列斐伏尔感觉到资产阶级世界的日常生活不再有价值,一定意义上,批判方式的转变,源于他更想弄清楚生活到底是什么,才能深入到“怎样生活”和“怎样生产”的更深反思层面。这实质上是批判的逆向行进,即通过不同生活方式的比较,在日常生活批判中实现马克思意义上的改造旧世界。如何看待列斐伏尔这种日常批判转向?一方面,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的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机制的调整和借鉴,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确出现很多新问题和现象,较之于以前,宏观显性的统治和批判方式不明显,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奴役退缩隐匿到日常生活行为中,似乎只有通过揭露日常生活中的小异化,才能更直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世界的本原,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开启的日常生活批判转向确实是有理论贡献的,也值得关注和反思;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日常生活被殖民,表明资本的逻辑占据了社会的全部,日常生活缺失了自觉的创造性,这恰是资产阶级宏观资本逻辑的无孔不入的体现,因此,绝不能将对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批判理解为一种本质意义上的批判方式的改变,只是一种批判方式的“与时俱进”,是一种批判的具象化,仍然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资本逻辑。总的来说,列斐伏尔既没背离马克思主义,更无反马克思主义,只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在战斗。

其次,哈维用资本逻辑研究代替城市发展逻辑研究,主观认为城市发展史就是以城市为载体解决劳动力和资本过度积累的历史;资本主义的生产就是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而这一过程完全是资本积累的需要,正是因为资本逻辑的增值欲望和可能性才导致资本主义城市规模的无限扩张,但“扩张并不会导致和平”。<sup>[10]</sup>他教条化地以马克思资本逻辑分析为框架,将资本主义城市发展植入其中,以资本积累过程“规范”城市发展过程,忽视城市发展的综合性因素。就像他认为重建巴黎的目的是通过“长期地将资本用于空间关系的重组”,克服“资本主义的第一大危机”。事实上,奥斯曼重建巴黎一个重要目的是“想让巴黎成为一个配得上法兰西,甚至西方文明的一个首都”,也就是说,城市的发展是综合因素导致的结果,并非简单的“资本一元论”能够决定的。哈维主张通过城市运动来解决城市发展中的问题以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言之,就是通过城市革命实现对城市权利的诉求,即主张通过城市生产者和再生产者以城市社区为基础的联合,争取以支配城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城市权利。事实上,阶级斗争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根源在于生产中对劳动力的剥削和异化的反叛,这就要求从根本上解除生产中资本与劳动者之间允许资本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的那种阶级关系,深入到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抛弃物质的制约。在此意义上,哈维所提供的实践方案只是显露出解放政治学的微光,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制度体系。

再次,从问题实质上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信息时代的来临,当城市空间问题不再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时,列斐伏尔、卡斯特等开始怀疑甚至是质疑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城市实践的解释力和引

领力。他们试图通过日常生活批判和集体消费、网络社会批判来揭示社会矛盾,实现城市改造和解放议程。这本身看似没有问题。实际上,他们只满足于观察日常生活以及集体消费对城市社会的建构能力以及调节能力,而对私有制条件下城市社会所表现的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不感兴趣,只是流于生活表象,忘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层面: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在本质上是其内在矛盾的再生产过程,它决不会因为通过日常生活和集体消费以及网络社会表现出来就被权力及社会结构性再生产过程所替代。尽管哈维宣称自己要的是宏大叙事,但从其新近研究来看,在《叛逆的城市》和《资本主义的十七个问题》中开始重点关注微观生活领域,不同的是,他仍然部分坚守马克思主义中心议题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这种将批判对象置身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之外的做法,实际上掩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无论从批判还是解放的视角看,都远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制度本身。其结果不是要破坏一切既定的东西,建立新世界,而是在客观上维护了现存社会秩序。

纵观新城市学派城市研究范式的转换,由开启马克思主义与城市批判相结合研究到城市批判路径的再选择,标志着新城市学派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转变,这种转变既与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新变化有关,也与城市本身问题域以及学派本身的理论视域转变有关,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无法涵盖与理解新的城市问题。可以看出,新城市学派理论未来有两个走向较为明晰,一是理论远离宏大叙事,进一步走向微观生活领域;二是远离马克思主义中心议题,但解放议程的价值目标不变。“城市化是一个深刻的综合变迁过程”,<sup>[11]</sup>“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全部社会关系再生产,必然涉及利益分配到生活方式再造,再到意义更新全部社会生活内容”<sup>[5]</sup>,本质上是城市规模扩张与人的城市化的统一。城市“公共空间的终结”<sup>[12]</sup>，“城市记忆消失、城市建设失调、城市形象低俗、城市环境恶化、城市精神衰落、城市文化沉沦”<sup>[13]</sup>,城市化进程中文化失调、价值冲突,以及“地方性”丧失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城市化似乎迷失了方向。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否都市化,或都市研究能否马克思主义化?究竟是要以都市研究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还是以马克思主义来重新理解都市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此意义上,历史地理地看,我们的确需要一种发展着的、开放的、面向未来的而不是现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体系为今天城市研究和城市实践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这是关乎未来城市化方向和质量的重大问题,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仍然值得挖掘并发扬光大,形成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的城市社会理论的范畴方法,增强其在当代城市实践中的解释力和引领力,而不是另起炉灶。当列菲弗尔、卡斯特、哈维等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城市发展中遇到了危机”之时,其实,这“危机”正是他们没有正确处理和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在城市研究中的作用所造成的危机。同时,这种危机必然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去深入探索和思考。

## [参 考 文 献]

- [1] [美]爱德华·W. 索亚. 后现代地理学[M]. 王文斌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36.
- [2] [美]乔尔·科特金. 全球城市史[M]. 王旭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
- [3] [美]艾拉·卡茨尔逊. 马克思主义与城市[M]. 王爱松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
- [4] [美]爱德华·索亚. 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68.
- [5] 胡大平. 都市马克思主义导论[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
- [6] 胡大平. 城市与人[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72.
- [7] 牛俊伟. 城市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城市[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58.
- [8]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M]. London: Verso, 2006:374.
- [9]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M].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9:312.
- [10] [美]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 宋俊岭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544.

- [11] [美]布赖恩·贝利. 比较城市化——20 世纪的不同道路[M]. 顾朝林 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5.
- [12] Don Mitchell. The Right to the Cit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3:35.
- [13] 单霁翔. 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M].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3:5—7.

(责任编辑:谢光前)

## Marxist Urban Criticism and Paradigm Shift from Production to Everyday Life: A Case Study of the New Urbanism

YIN Cai-xiang, YAN Ming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44)

**Abstract:** The School of New Urbanism initiates its research on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modern urban criticism, and discusses the central ideas of Marx on urban liberation. With the changes of capitalist urban functions and themes, the criticism and paradigm of the New Urbanism also shifts from production to everyday life. To be specific, Henri Lefebvre's political-economic narrative criticism which was based on the capitalist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influenced by the macro interaction of the economic basis and the production mode, turned to the everyday life criticism from a much micro perspective; Manuel Castells shifted his attention from capital and class to collective consumption and network society; David Harvey changed his criticism from the mode of production with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to community and city rights. On the whole, the urban criticism of new urbanism presents two features: first, its theories get away from the grand narrative towards the micro life; secondly, it is far away from the central issues of Marxism, but the value goals of liberation remain unchanged.

**Key words:** the New Urbanism; Marxism; production of space; everyday life; urban criticism